

社会与思想丛书

学科 · 知识
· 权力

&

华勒斯坦等著

DISCIPLINES. KNOWLEDGE & POWER

S

学科 · 知识 · 权力

&

〔美〕华勒斯坦
(I. Wallerstein) 等著
刘健芝等编译

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天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科·知识·权力/(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 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3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1243-X

I.学… II.①华… ②刘… III.知识-作用 IV.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772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牛津大学出版社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9年3月北京第1版 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42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12.00元

DI24/05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在大陆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旨在更有系统地积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们希望，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与思想丛书”将主要注重对西方社会与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70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经济领域，所谓“福特式大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促发对“后福特时代生产”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福特式生产”的历史成因及内在阙失：在政治领域，西方现存体制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发展的尖锐张力，已重新激发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 v.s 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这一基本辩论；在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但已全面动摇近代西方苦心营构的文化秩序和价值等级，而且更进而对“西方传统性”本身发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

在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样全面重新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本丛书将不仅包括对当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强调对西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西方传统内在差异性的研究。

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与思想”,自然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对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应该日益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干。从学科的角度讲,亦即希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人文及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与跨学科的研究去深入认识中西现代性与中西传统性,以往那种僵硬的“传统 v. s. 现代”、“中国 v. s.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将会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学术世界为此任重而道远!

社会与思想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专题导论:从学科改革到知识的政治	编译者	1
学科规训制度导论	沙姆韦 梅瑟-达维多	12
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	霍斯金	43
意想不到的逆转		
会计学:一门学科规训	霍斯金 麦克夫	85
被忽略的补充		
管理学:一种道德技术	鲍 尔	130
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	亨 特	154
人文学科的政治理性		
超越年鉴学派?	华勒斯坦	213
译后余话	译 者	227

专题导论

从学科改革到知识的政治

过去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认识，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有人以“知识爆炸”来描述这种变化。但与此同时，知识的急剧发展，知识范围的迅速扩大，除了增加了人类主宰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之外，也同时带来不少前所未见的问题。生态的破坏、战争的威胁、社会秩序的急剧转变、人们思想和意识上的不安，在在都显示知识的增长并非一个可以无限膨胀的气球。在各种可能出现，而不少正在日益恶化的问题未至不可收拾之前，摆在人类面前的挑战，便是如何令知识的增长能真正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福祉服务，如何令追求和发展知识的活动，可以同时发展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

不过此等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理想，面对现代世界各种越来越复杂而庞大的学术体制，似乎有点无能为力，原因是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这不单只是说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只是为功利的社会国家目标甚或个别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服务，而是说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关于知识发展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关乎学科门类的偏见，及这些偏见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互相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学科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但同时也有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 (self-serving) 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学者进行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过去数十年来亦有不少新的尝试和改革方案付诸实行，例如各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如地区研究等，成绩亦见参差。为了探索当代学科分隔背后更深广的历史原因，华勒斯坦 (I. Wallerstein) 为首的一群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今年以多种语言出版了一份题为《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下简称《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版) 的研究报告，号召社会科学工作建立一种更开放和更“扎实可靠的知识”(valid knowledge)。

他们指出，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主导着的学科划分，起始自 19 世纪，将社会研究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互相分割的学科。这套学科划分准则内含着对掌权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它们一一被建构出来的期间，国家政权的力量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国家一方面促成大学的复兴，使大学成为生产知识的主要场域，又引导大学的学科知识往实用的政策导向研究。其结果是使以牛顿力学为模型的科学主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种强调探求事物普遍规律的学问法则，使精确度和实证性成为量度一切知识的标尺。

这种发源于英、法、德、意和美国的 19 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是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战后初期美国霸权宰制和世界经济急促增长之下，这种带欧洲中心视点的社会科学学科范式更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扩散，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学术体制正统模式。然而，随着欧美霸权的日渐衰落和世界各地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各种反欧洲中心/父权中心的努力提出了多种在知识领域的非殖民化要求。这种要求除了在政治上要求改组和扩大学术殿堂的构成和人选之外，在知识论上亦对主流的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作出挑战。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的重新融合，“新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冲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挑战着规律科学和描述特性的学问之间的分野，人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分也被动摇。

在这些新趋势之下,《开放社会科学》作出了重建一种更扎实可靠知识的号召。

不过,应该重建什么样的社会科学呢?《开放社会科学》提出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分,不再以国家为分析社会行动时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提倡一种“多元普遍主义”,建构一种新的客观性观念。这几项主张既要面对和梳解追求规律知识和理解特殊现象的张力,也要在批判绝对中立知识这错误前提的同时,拒绝把知识零碎化。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开放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些弹性地跨学科的制度改革建议,例如跨学科的研究计划,强制性的跨学系联合聘用制度,跨学系的研究生培训等,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改革纲领,踏出把社会科学开放出来的第一步。

作为一份讨论纲领,《开放社会科学》诚然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而虽然它在分析这套社会科学框框的历史建构过程,并没有忽略权力的向度,但它仍然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经济脉络层面上的宏观分析,从历史处境对知识生产的外缘性影响出发,缺乏了从微观层次上,探索这些知识和它们的生产方式,如何在形塑着其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在构筑着创造这些历史的不同主体,以及这些知识是如何与各种其他层面的技术配置互相模塑。由于忽略了这个层面的分析,所以华勒斯坦等人对学科知识和权力机制的关系的分析,并未能击中要害,其改革方案虽然是主张对知识的生产条件要有历史意觉,但其建议最后亦只是紧紧地依从着科学主义所要求的知识论条件来提出的:这

种分析和改革建议的盲点，正是忽略了对 discipline 这一概念除了学科之外的另一重意义，也就是福柯（M. Foucault）所指的规训方式的了解。

这个专辑的几篇选文，便是从 discipline 同时作为学科和规训方式这个角度出发，探讨“知识—权力”体制的构成，以便读者能作出对照。这专辑的第一篇文章《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从 discipline 的字源追溯其代表知识和权力的两种含义，追溯了学科规训制度生成的历史，指出了各种学术组织和大专学院如何依据一些排他性的方式，与其他机构合组成各种学术社群，掌握着各种资源和权力，左右学科发展的方向。作者的分析背后所隐含的立场，是将学科知识不单视为纯粹的知识论层面的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但跟其他过去的知识生产方式比较，学科规训制度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在这种层级界限森严的运作前提下，学科规训制度其实是社会控制和轨调（regulate）方式的一部分。而所谓跨科际规训制度，虽云是要弥补缺陷，打破僵化的学科界限，但由于往往没有碰及知识生产组织结构的根本，所以仍然会排挤掉各种变革的力量。作者特别以女性主义的新知识形式为例，说明学科规训制度可以将女性主义等各种新型知识吸纳，但仍将女性主义等所提倡的改造社会关系事业拒诸门外。

《教育与学术规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下简称《教育》）和《会计学：一门学科规训——被忽略的补充》（下简称《会计学》）两文，一方面批判福柯的局限，另一

方面也进一步发展了福柯的观点。《教育》一文指出虽然教育学往往被视为一门次学科，似乎比其他学科缺乏地位，但从系谱学的追溯可以看到，所谓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其实是新的教育实践形式所带来的。18世纪后出现三种新的教育技术——考试、评分和书写——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教育者与学生的关系。这些微细的教育实践方式改革，对整个近代学科规训制度的生成起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它们使教学双方都要面对经常性的监视和评断，因而慢慢地懂得作出自我规训，对自身的身体以及思想作出经常的检查、评核和计量，不断衍生出一种会对自我进行检查审视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形式，正是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石。

《会计学》一文则从会计学分析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文章的出发点是将学科知识的问题，从狭义的学院范围扩展到广义的现代学科规训世界，论证会计学并不是人们往往认为的从属学科。会计的存在由来已久，但只是到了近代，会计才被转化为一种将人和各种社会事物变成可审计对象的制度。而透过与种种新的教育实践方式的结合，并通过军事学院的规训，会计学被转化为可应用于大企业的管理。会计和其他可将事物变成可审计的各种制度，现在已渗透入各类公共及私人机构，所以它不仅是经济学的一种辅助性补充，而是一种像德里达(J. Derrida)所说的“添补”(supplement)权力，成为现代学科规训制度的柱石。作者这种系谱学的追溯，扭转了学科规训制度内一种

以复杂理论为优先的偏见，作者突出了会计作为一种微观、实在的社会实践，起着统领而非从属的实质作用，构成现代世界和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形式。虽然作者没有直接谈论改革的方法和方向，但对照着华勒斯坦在上述《开放社会科学》一书的主张，我们大可看出其旨趣的差异。

《管理学：一种道德技术》一文指出现代主宰学校运作的管理主义，可以充当福柯所说的“道德技术”(moral technology)和权力技术的最佳例子。管理主义的办学方式把层级监视、齐常化评断(normalizing judgement)和对自我的审查等制度引用到学校日常运作之上，不单学习者受制于管理学的规训，教研工作者和学校本身亦被化为“一堆可以被描述、计算、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受到无形的规训权力的监控和审制，而这些监控同时是以管理学和教育行政的学科知识出现的。管理和行政成为教育的骨干，一方面是人文心理学和系统理论等学科主导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突出了这套以管理为中心的论述，是增强了管理人员而非教育工作者的权力。但管理人员之所以具有这种权力，反过来又是学科规训制度下，被管理者为机制、程序和各种技巧所臣服，不断被客体化的结果。所以，教育领域内管理人员拥有的权力，是一种学科规训性的微观权力，教育和学科改革的议题不可能回避这个面向。

上面几篇文章，从教育形式、会计和教育管理的角度，不约而同地带出纯知识层面之外的社会制度及实践方式面向，从而讨论学科规训制度的问题。或者一些读者会认

为,这些仔细的历史系谱学追溯,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抗议和哀叹规训世界对人的主体性的控制和卡压,希望从科技文明的宰制下发出人文精神的拯救呼吁。不过,《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人文学科的政治理性》(下简称《人格》)一文的作者亨特(I. Hunter),则尝试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以历史上人格形成方式的转变来检讨学科知识的规训性质和人文主义批判的局限。本文作者强调,把社会主体纳入为规训控制的范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曾以脱魅(disenchantment)的概念来捕捉这种理性宰制的历史进程。然而,作者认为韦伯的分析,仍走不出将人文精神和功利实用的知识对立起来的死胡同,从而误导了对学科所负载的权力性质的批判。

《人格》一文首先指出,把人文学科(或自由民教育/完人教育)与强调实用性的专业学科对立起来,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事实上,人文学科/自由民教育亦有其实用的目的。回顾历史,种种建构人格和“公民素质”的技艺,原来是不同社会群体生活与谋生的技巧,却并不是从来就具有理想批判性质的标尺。相反,它们是一些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机缘凑合地出现的产物。自由民教育并不是只有一种理想的人格形态作为最高目标,而是按历史特殊情况而异,是管治和道德技术配置起来的结果。人文学科/自由民教育具有同样是功利实效的目的,并不是某种管治险谋的结果,而是这些管治技术的配置,把人格培育工作亦“带进了

政治计算的范围”。《人格》一文的分析依赖在后期福柯理论体系出现的“管治工程”(governmentality)概念,在理论层面上挑战了韦伯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式的批判,在政治上亦指出这种对知识和学科体系所作的道德主义改革,其实搔不着痒处。因为这些道德批判一样可以被配置成道德技术,满足特定的管治工程下人格培育工作的需要。

如果我们拿《人格》一文所代表的福柯式立场和华勒斯坦互相对照便很有趣。除了上述那篇《开放社会科学》的报告,华勒斯坦 90 年代初写就的,也就是本专辑的最后一篇文章《超越年鉴学派?》(下简称《年鉴》),为他的改革方案奠定一些分析的基点。他曾指出超越学科性的约制不能靠简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因为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些简单的跨学科建议其实只会强化固有学科的界限。因为它预设了原来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不言而喻地首肯了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地存在。为此,《年鉴》一文提出要“超越年鉴学派”那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特别指出要在制度和学术组织上有所突破,改变那种“从 19 世纪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前提发展出来的大学体制”。

华勒斯坦等的呼吁,无疑是一个彻底改革的号召,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激进派看来仍然只是体制内改良。但从亨特的立场看,这些提议的毛病,似乎并不是不够彻底,反而是有点过分彻底。因为在每种技术能否成功地被配置在管治工程之内这问题上,是没有任何一种论述和实践先天地就可免于权力的沾染,反过来说,也不能事先保

证这种吸纳和配置一定可以成功。于是乎，一切只是有待在每个具体细微的场合上，参与各方的力量对比，实现条件能否凑合来决定。这种改革的政治策略所关心的不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改革方案，而是这些“完善”方案所提出来的各个个别细微的处境，所以亨特说，“没有一个孤立的定点可以或应被用作抵抗这种权力。”回答社会科学的改革是否能真的可以修正，以至扬弃社会科学偏见的问题，端赖我们如何分析更细微的历史处境。

不过，从华勒斯坦的角度，也可能认为福柯式的讨论会过于零碎，在建立一个扎实可靠的批判基点的时候，福柯的分析听起来好像是宣称天下一切都无所遁逃于权力的天罗地网，于是悲观主义地以为不用找寻解放出路。华勒斯坦等对此应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在他眼中，已经在全球的不同角度都建立了主导地位的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已到了非作全面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而这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宏观的历史环境决定了的。

华勒斯坦和福柯式研究进路的分歧，自然是源自他们对“历史”这概念的不同界定和预设。他们对社会践行者的“历史处境”(historicity)的感知触觉都大不相同。我们在这里应将评断或调和这两种不同的学术政治路向的责任交还给读者，但亦不能不提醒读者留意他们各自对历史理解的局限。华勒斯坦所述的宏观寰球历史处境，从某个意义来说有其普遍适切的地方，但其分析的对象仍是以欧洲为参照。而就算是提出微观权力面向的福柯学派分析，其对

学科规训制度源流的追溯，也未能顾及欧美以外各地情况的差异，以及各种对学术体制的差异性运用或颠覆尝试，当然亦没有谈论不同学科规训与体制外的社会实践的互动。需要对各地学科规训制度和实践有更深入和广泛的理解和研究，对话才能真正展开。

不过总的来说，本专辑几篇文章的作者所展现的，更多地是一种共同的对学科改革和广义的知识政治的关切。这种关切催使我们去建立不同的反思策略，为学科改革和为求取学问的活动，以至更广义的社会实践，建立可以养成反省能力的机制。它肯定地要求我们以一种“反思着的参与者”的身份出发，以有所介入(engaged)为前提，亦以有所抽离来保持学问上批判空间的开展。就如如在《学科规训性导论》一文的作者所言，谋求改造现存社会关系者，必须像前期的女性主义者一样同时是学科规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以一种“内里的局外人意识……批判和自省在学科之内、之间、以至在对立面上的活动”。如此才能在宏观和微观，以及不同的历史脉络之间开展辩证对话，以求建立比今日更为扎实可靠的知识。

编译者